

内战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 与内部冲突

——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周亦奇

【内容提要】 在内战进程中，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有时会构建起联盟共同反抗政府军，而有时则会相互袭击引发内部冲突。对于此现象的解释已是当前内战研究理论的重点。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对此问题提出的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解释，文章认为单纯的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均无法解释反对派联盟的形式与瓦解。因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将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交互影响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冲突。在政府军实力较强的情况下，理念因素无法起作用，而反对派内部实力均衡与否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外部支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文章以叙利亚内战作为阐释性案例，采取案例内比较的方式，对提出的逻辑进行分析。

【关键词】 反对派联盟；叙利亚内战；反对派武装；联盟构建；内部冲突

【作者简介】 周亦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233）。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7.02.007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 (2017)

02-0125-23

* 作者感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于宏源研究员、封帅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孙芳露老师，周晓加、叶诚成博士后以及王凯、曹航、张友谊同学对本文初稿的点评与建议，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邀请的匿名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文责自负。

在冲突研究理论中，内战理论长期以来是研究的热点。而伴随此领域的发展，分析层级多层次化、分析单位微观化、分析过程机制化已成为当前内战研究的重要趋势。受研究趋势影响，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联盟构建问题渐成研究重点。与传统内战研究相比，对反政府武装联盟的研究把传统上被视为铁板一块的反对派武装进行分解，将分析单位下移至反对派组织内各个派别武装。在充斥着多支反对派武装的内战进程中，一个反对派武装究竟是选择与其他武装合作抗敌、还是与其他反对派武装兵戎相见？这是反对派联盟问题的关键，也是本文希望有所贡献之所在。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批判性继承和总结，本文尝试将既有研究中的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提出一个综合的分析理论框架，对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提出一些推断假设。同时，为了更好地体现本研究提出的假设与现实政治的结合程度，笔者以目前广受关注的叙利亚内战为切入点，对叙利亚内战进程中的反对派联盟实际行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并为日后更完善的验证打下基础。

一 内战中的联盟机制：既有研究回顾

自古以来，联盟一直是人类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手段。自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战争数量的减少，内战成为当前世界主要的战争形式。内战反对派联盟构建也成为其中的重要现象，而对其理论的研究也顺势而上成为热点。此类研究扬弃了此前将内战视为由政府 and 反对派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政府和反对派不应被视为统一（unitary）的行为体，还应关注两者内部的情况。^①因此，当前内战研究主要理论范式已从单纯的政府 - 反对派分析模式，转为由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构成的跨层分析模式。这类研究除了探讨宏观层次上的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对抗，还分析反对派内部政治进程，从而实现了从微观机制到宏观结构的互动。^②

对于反对派武装联盟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分析反对派联盟的影响和探究这类

^① Laia Balcells and Patricia Justino, "Bridging Micro and Macro Approaches on Civil War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ssues,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8 No. 8 (December 2014), pp. 1343-1359.

^② Stathis N Kalyvas,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联盟形成的原因两类。就第一类研究而言，一部分学者分析反对派内部的竞争与合作对内战发展和结果的影响。有研究讨论了抗争运动组织内部的碎片化的影响，认为反抗组织内部分裂会导致其采取激进和暴力的抵抗策略；^① 在由多个反抗组织发起的抗争运动中，不同组织会在谋求集体共同利益的同时追求个体利益。^② 还有研究认为，内战中反对派组成联盟后将增强反对派武装的势力，延长内战的持续时间，增大和平解决的难度。^③

在本文中，笔者关注的是反对派武装联盟构建与内部冲突爆发，也即反对派武装在构建联盟与内部冲突的选择问题。根据既有研究，影响反对派联盟构建和内部冲突的因素主要有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两类。理念因素派认为，观念因素决定了反对派在合作联盟与内斗对抗之间的选择。而物质因素派则遵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认为反对派武装自身实力和由此引发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是决定反对派是否进行联盟的根本因素。具体而言，理念因素派和物质因素派具有如下观点。

（一）理念因素

理念因素派认为，理念（族群认同、意识形态）将对反对派武装组织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观点认为，组织之间的团结与否取决于它们能否形成共同身份，而共同身份的建立往往需要以共同的理念为基础。故而，在缺乏共同理念的情况下，反对派武装构成的联盟将面临严重的“承诺困境”，即联盟中的成员都将恐惧彼此可能发生的背叛行为，因此联盟难以维持。而共同的意识形态可以帮助反对派联盟化解这一承诺困境，从而实现联盟的长久维持。具体而言，理念因素对反政府武装联盟构建和内部冲突的影响可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理念的差异性增加反对派之间的协调难度，导致联盟难产、内斗丛生。既有研究认为，反对派武装的理念主要由其意识形态和民族身份决定，相同理念

① Wendy Pearlman, "Precluding Nonviolence, Propelling Violence: The Effect of Internal Fragmentation on Movement Protest,"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7, No. 1 (March 2012), pp. 23-46.

② Peter Krause, "The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of Non-State Violence: A Two-Level Framework to Transform a Deceptive Deb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2 (May 2013), pp. 259-294.

③ Michael W. Doyle and Nicholas Sambanis,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 Theore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4 (December 2000), p. 789; Seden Akcinaroglu, "Rebel Interdependencies and Civil War Outcom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6, No. 5 (October 2012), pp. 879-903.

会降低不同武装之间的协调成本，从而促进集体行动。^①而不同理念的反对派武装之间则会因缺乏互信而难以合作。^②例如，有学者认为，伊拉克战争之后，逊尼派反美武装和什叶派反美武装之间之所以无法联盟，其原因就是不同宗教信仰带来的理念差异。^③还有研究认为，因战前社会结构形成的理念差异会对反叛联盟团结与否产生重大影响。战前互动较多、理念较一致的反对派武装在战时也可构建起整合型较高的联盟，而战前互动较少、理念差异较大的组织，战时联盟构建也较为困难。^④

第二，拥有极端理念的反对派武装将增加反对派武装之间的联盟难度。这一观点认为，理念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同则相合、异则相斗。要在理念之中进一步具体区分极端理念和温和理念的作用。温和理念的反对派即便是不同理念也可协作，而极端理念的反对派即便是拥有相同理念也会斗争。^⑤例如，有学者认为，在伊拉克的基地组织与其他反美武装之间的内部冲突，主要是由于基地组织的极端理念所导致。^⑥

（二）物质因素

物质因素派认为，理念因素并非是一个影响反对派联盟建构的主要因素，物质因素才是决定反对派联盟行为的主要因素。此派观点不顾反对派武装理念的差异性，将内战中反对派武装视为相同的理性行为体，假定其诉求都是物质利益（权力或胜利）。故而，物质因素理论遵循了现实主义理论中对于“最小化胜利联盟理论”（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⑦的逻辑。反对派联盟的成员一方面要考虑从政府军手里夺取权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考虑在胜利后权力分配的问题。故

^①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tini, "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4 (December 1996), pp. 715-735.

^② Stephen Stedman, "Spoiler Problems in Peace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2 (Fall 1997), pp. 5-53; Ethan Bueno de Mesquita, "Conciliation, Counterterrorism, and Patterns of Terrorist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9, No. 1 (Winter 2005), pp. 237-258.

^③ Paul Staniland,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Insurgent Fratricide, Ethnic Defection, and the Rise of Pro-State Paramilitar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6, No. 1 (February 2012), p. 20

^④ Paul Staniland, *Networks of Rebellion Explaining Insurgent Cohesion and Collap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⑤ Andrew Kydd and Barbara F. Walter, "Sabotaging the Peace: The Politics of Extremist Viol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Spring 2002), pp. 263-296.

^⑥ Ahmed Hashim,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⑦ William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Fotini Christia, *Alliance Formation in Civil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而，反对派武装往往先要构建一个确保能够战胜政府军的联盟（即胜利联盟），但在此后还要对联盟内部进行“瘦身”，通过排斥内部成员来确保自身在权力分配中获得最大的份额（即最小化过程）。因此，即便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反对派组织，也将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排挤。

具体而言，物质因素派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政府军实力是导致反对派是否联盟的关键因素。这一理论遵循经典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逻辑，认为联盟会随着对手实力的强大而日益团结。作为反对派在内战中的主要对手，政府军实力越强，反对派武装单独生存的难度就越高，其构建联盟的可能性随之提升。^①反之，在政府军实力较弱的国家，反政府武装合作而求互保的动力也越小，其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内讧的可能性也会上升。

其次，在反对派之间相对实力均衡的情况下，反对派联盟将会维持，而在失衡的情况下则会出现反对派武装之间的内部冲突。这一观点也继承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均势和平论的思路，认为稳定均势将带来和平，而均势失效则带来战争。在反对派内部相对实力对比不均衡的情况下，较强的反对派武装就会有动机剿灭较弱的反对派武装，而较弱的反对派武装为防止自身被消灭，也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反对派之间的内部冲突就会爆发。^②

最后，反对派武装会因物质利益的考虑，对其他反对派武装进行打击。既有研究通过分析族群战争中同族反叛武装的相互对抗，^③认为反对派自相残杀的主要原因就是对物质利益的考虑。通过剿灭内部竞争者，反对派武装可以接管对方曾经掌握的人员、获得对方的领土和经济资源，故而，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反对派武装会出现内部冲突。^④在此过程中，理念的作用只是在内部冲突爆发后为反对派提供一些可作为借口的话语，以标榜其行为的正当性。例如，有研究认为，塞尔维亚内战中反对派之间的内部对抗，只是为了争夺领土，与任何理念均无关系。但是，这些反政府武装都喜好宗教、民族等理念性的因素来为其行为提供借

① Jeff Goodwin, *No Other Way Out: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Fotini Christia, *Alliance Formation in Civil W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Stathis N. Kalyvas, "Ethnic Defection in Civil Wa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 No. 8 (August 2008), pp. 1043-1068.

④ Hanne Fjelde and Desiree Nilsson, "Rebels against Rebels: Explaining Violence between Rebel Group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6, No. 4 (August 2012), pp. 604-628; Lee J. M. Seymour, "Why Factions Switch Sides in Civil Wars: Rivalry, Patronage and Realignment in Sud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Fall 2014), pp. 92-131.

口，掩盖其背后的真实用心。^①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物质性因素和理念性因素两方面为我们理解反对派武装的联盟问题提供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思想，但既有研究普遍存在着过度强调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之间的矛盾，而忽视其结合可能性的不足之处。

第一，单独强调理念因素存在本体论上先验决定和认识论上循环论证的问题，且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本体论上，单纯强调理念因素会陷入观念决定论的错误归因之中，认为一切行为都由一个先天的观念所决定，但却忽视了行为体后天的主观能动性；在认识论上，观念往往是无法直接观测的，故而此理论往往倾向于用行为来回溯背后的理念。例如，当观察到一个组织在战场中滥杀无辜、采取暴力的行为，就推定该组织是由某种极端理念驱动的，这样的认识论看似符合常识，但却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中。同时，单纯强调理念因素也忽视了实践中大量相同理念组织自相残杀的案例。

第二，虽然本文承认单独强调理念因素的问题，但一味强调物质因素也并非正确。其实，物质因素将反对派自身复杂的动机和立场盲目地简化为所谓的“普世理性”，看似符合实际，但其实也犯了与单纯强调理念因素一样的错误，即用一种先验形而上的假设来推断行为。实际上，若完全按照物质因素派的观点，内战中的反对派武装只会像机器人那样，自动形成联盟对抗一个实力较强的行为体，但这与现实并不相符。即便我们承认反对派联盟的形成是由均势的逻辑决定的，但此均势也并非机械地对实力最强的对手进行制衡，而是将物质与理念结合后，建立联盟以制衡对其威胁最大的对手。^②

因此，为了克服这种物质和理念因素二元对立和整合不够问题，本研究将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提出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

二 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将研究背景设为多个反对派武装参与的内战，将研究对象设为这些反对派武装在联盟和内斗中的选择（下文简称“反对派联盟与否”）。在研究机制上，本文遵循既有研究的观点，以“承诺困境”作为影响反对派武装联盟与否的

^① Fotini Christia, *Alliance Formation in Civil W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这个逻辑可参考：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 of Alliance*,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主要机制。在自变量上,本文在理念因素上选取理念差异和极端理念两种因素,将物质因素中的政府军实力和反对派实力对比并进行结合,分析其交互效应。此外,本文根据内战实际情况,引入外部支持变量,分析其对反对派联盟建构的影响。

(一) 研究背景

多行为体内战是本文的总体背景。多行为体内战是指内战中交战方超过两个,呈现出政府军与多个反对派武装进行战斗的内战。^①这类内战除了要分析反对派武装作为一个集体与政府军的对抗,还需分析反对派武装内部各个武装的政治关系。

(二)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反对派武装内部的联盟构建和内部冲突。本文所指的反对派武装特指拥有武装力量、暴力反对政府的组织,没有武装的反对派不在本文考虑范围。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是指反对政权武装构建起联盟,共同反对现政权。^②内部冲突则是指反对派武装彼此之间发生暴力袭击。因此,本文试图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具有共同反政府立场的武装组织有时会联盟抗敌,但有时却会自相残杀。

(三) 影响机制

本文认为“承诺困境”(commitment problem)是决定反对派联盟与否的关键机制。^③“承诺困境”是指当反对派武装存在不同理念或存在相对实力差距时,反对派武装对联盟承诺的可信性疑问以及对其他组织背叛联盟的担心。该机制认为,联盟形成的关键就是反对派武装克服“承诺困境”,形成集体行动与合作。而反对派武装内部冲突爆发则是“承诺困境”无法克服的结果。

(四) 影响因素(自变量)

如前文所说,本文试图整合影响反对派联盟与否的物质因素与理念因素。具体而言,本文将理念因素中的理念差异性和极端理念与物质层面的政府军实力、反对派内部实力对比进行结合,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加入外部支持这一变量,从而更加综合地分析内战反对派联盟构成和内部冲突爆发的逻辑。

^① 关于多行为体内战的代表作品可参考:David. E. Cunningham,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Idean Salehyan, "It Takes Two: A Dyadic Analysis of Civil War Duration and Outcom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3, No. 4 (August 2009), pp. 570-597; Lotta Harbom, Erik Meander and Peter Wallensteen, "Dyadic Dimensions of Armed Conflict, 1946-2007,"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5, No. 5 (September 2008), pp. 697-710.

^② 这里既包括联盟的形成,也包括了联盟的维持。

^③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379-414; Navin A. Bapat and Kanisha D. Bond, "Alliance between Militant Group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4 (October 2012), pp. 793-824.

本文认为，在政府军实力较强、对反对派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理念因素对反对派联盟构建的影响不大；而在政府军实力较弱、反对派生存威胁较轻的情况下，理念因素对于反对派联盟的构建和内部冲突爆发是存在影响的。而反对派内部实力均衡与否，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外部支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 理念因素

理念因素在本文理论框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故而对其定义、分类和作用进行阐释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中的理念主要是指某一反对派武装信奉的国家建设原则，并将其分为温和理念组织和极端理念组织。这一分类的标准根据某组织是否认可建立民族国家、是否接受现代民主体制等两个维度进行界定。^① 所谓认可民族国家，是指反对派组织谋求在某一国土范围内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政府，而不接受民族国家，则是指某反对派组织谋求建立一个超越领土范围、回归古代政体的国家。例如，一些组织宣布建立“天国”或“哈里发国”的主张就可认为是极端理念的。其次，接受现代民主体制是指某反对派组织谋求建立以人民主权为主体、多元共存的政治体制。而拒绝民主体制则是指某组织排斥民主，谋求建立以某一种思想或者宗教专政的国家。因此，本文认为，倾向于建立多元民主和民族国家的组织可被认为是拥有温和的理念反对派组织，而倾向于建立专制、复古、非民族国家的组织可被认为是极端组织。本文对极端主义的定义并未从其行为的残忍性出发，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循环论证错误。同时，在内战中，行为的残忍性并非单纯是由极端政治理念导致，而更多是互动的产物。一个温和的武装派别，面对拥有极端主义理念的敌人时，其行为恐怕也是非常残忍暴力的。

为了清晰地阐释本文的逻辑，本文假定在内战中存在两支反对派武装（简称A武装与B武装），结合温和与极端两种理念，总共可出现AB皆温和、AB皆极端、AB理念不同（A极端B温和、A温和B极端）等三种情况（见表1）。根据既有研究，理念因素中的理念差异性和极端主义理念是影响反对派联盟与否的重要变量。理念差异性会加大不同反对派武装之间联盟的难度，而极端主义理念则难与任何其他理念（包括其自身进行兼容）。由于理念差异和极端理念之间存在一定重合性，故而本文将理念差异性和极端主义理念进行整合，认为在不考虑物质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只有当两支武装具备温和派理念时，反对派联盟才可构成，

^① 这一定义参考了当前国内学者对“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研究，参见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27页。

否则只要在反对派联盟中有一方拥有极端主义理念，那么反对派武装之间就会爆发内部冲突（见表 2）。

以上对理念的分析建立在不考虑物质变量的影响之上。但如前所言，如脱离物质变量，则无法准确评估理念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把理念变量与有关物质变量进行结合后，才可观察到在相应的具体物质变量条件下理念因素所起的作用。在下文中，笔者将理念因素与政府军实力和反对派武装内部相对实力差距分别进行交互，以体现与物质因素结合后，理念因素的作用会发生何种变化。

表 1 反对派中的武装组织理念分布

A 武装 B 武装	极端理念	温和理念
极端理念	AB 皆为极端理念	AB 理念不同
温和理念	AB 理念不同	AB 皆为温和理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2 不考虑物质因素情况下理念对反对派联盟的影响

A 武装 B 武装	极端理念	温和理念
极端理念	内部冲突	内部冲突
温和理念	内部冲突	联盟构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 政府军实力

政府军实力的强弱是决定理念因素能否作用的必要条件。在政府军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反对派为生存只能采取结盟的策略，在此阶段反对派自身的理念不会影响联盟的建立。正如丘吉尔所言：“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会和魔鬼联盟”。^①当生存是反对派武装考虑的第一要务时，其他顾虑都会让位于这一考虑。

不过在政府军实力逐步削弱、反对派生存无忧后，理念对反对派联盟的影响就会逐步增强。仍以二战为例，在面对共同敌人时，丘吉尔可以与苏联结盟，但当希特勒被击溃后，曾经的英苏同盟也伴随着“铁幕”而彻底割裂了。在反对派拥有较强的实力并在战场上取得一定优势情况下，不同理念的反对派武装可能会爆发内部冲突。故而根据以上逻辑，我们可做出如下推论：

^① Winston Churchill, “If Hitler Invaded Hell I Would Make at Least a Favourable Reference to the Devil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http://www.brainyquote.com/quotes/quotes/w/winstonchu111298.html>.

推论 1：在政府军实力较强情况下，可观察到不同理念的反对派形成联盟。

表 3 政府军实力较强情况下反对派理念对联盟结果的影响

	A 武装		
B 武装		极端理念	温和理念
极端理念		联盟构建	联盟构建
温和理念		联盟构建	联盟构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 反对派相对实力对比

在政府军实力较弱、反对派生存安全的情况下，反对派中的相对实力对比被认为是导致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此观点认为，在实力均衡的情况下，反对派可因均势而联盟，否则就会因实力不均而爆发内部冲突。对此，本文认为，单纯相对实力对比并不会对反对派联盟产生影响。具体原因如下：

在实力平衡的情况下，理念将成为影响反对派联盟与否的关键。根据前文对于理念作用的分析，我们可发现，所谓“实力均势导致联盟稳定”其实存在理念前提，即只有双方都是温和理念的反对派武装时，方可建立联盟。传统物质因素派之所以认为均势会导致和平，这其实是将部分反对派具有的温和理念盲目抽象为所谓的“普世理性”，强加到所有反对派武装之上。而在其他情况下，只要有一方反对派武装拥有极端理念，反对派联盟的内部冲突就会爆发。这是因为，当极端理念组织获得了与其他组织一样的实力，并且暂无政府军带来的生存威胁时，其极端性会使其难以受均势制约，更无须说与其他武装合作。故而，实力均衡在此时并不能导致温和派武装与极端派武装之间相互遏制，反而会为发生一场剧烈的反对派内部冲突打下基础。本文还认为，即使联盟内两个组织均为极端主义武装，当实力平衡时，其也不会进行相互合作。这一论断根据是极端主义理念往往具有追求正统的特征。故而两个都宣称服从某种共同的极端理念的组织，也会因追求正统而视对方为需要清洗的异端，并自相残杀。因此在实力均衡的情况下，只有两个均为温和理念的反对派方可实现所谓的“均势下的和平”。

相对于实力平衡的情况，实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反对派联盟的情况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在此处，除了要考虑理念影响，还需考虑实力差距带来的影响。根据联盟管理的原理，^① 拥有更强实力的行为体可利用实力差距带来的强制力来强迫弱

^①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5-38页。

势群体跟随其理念。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在实力不均衡情况下，联盟选择主要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首先，在反对派内部成员均为温和派武装时，此时将构成稳定的反对派联盟。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无论是理念还是强制力都倾向于塑造一个更加紧密和更有组织的反对派联盟。

其次，在联盟内成员均为极端理念的情况下，实力较弱的极端武装会跟随较为强大的极端武装。虽然其极端理念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特征，但如果此时开展内部对抗，较弱的极端武装一定会被较强的武装剿灭，故而，实力差距将强迫弱小的极端武装追随强者。不过这种情况下构成的反对派联盟内部关系并不平等，而是一个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式联盟。^①

较难判断的是当反对派联盟内部存在一个温和武装和一个极端武装的情况。从理念进行推理，这两类组织理念水火不容，故而当一方实力强于另一方时，与对方爆发冲突似乎顺理成章。但考虑实力差距带来的强制力，也存在一方强迫与另一方对其自身理念进行调整并加入联盟的可能性。总之，在反对派联盟内部理念不同时，反对派之间内部对抗和相互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存在。本文认为，当温和派武装获得较强实力时，其与弱小的极端武装之间更可能建立联盟，而当极端派武装获得较强实力时，其与弱小的温和派武装更可能爆发冲突。此判断依据来自对“承诺问题”机制逻辑的考虑。不同理念组织如若结成联盟，必然需要其中的某一方（通常是较弱的一方）对其理念进行改造以适应对方的需求。这一改造能否得到对方的认可，弱小反对派组织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这些顾虑就成了较弱的反对派需要考虑的问题，构成了经典的“承诺可信性问题”。本文认为，温和派武装因其理念的包容性，故而具有更多的承诺可信性，而极端派武装则因其理念极端，所以承诺可信性较低。因此，在极端武装占上风时，弱小的温和派即使与极端武装进行合作，也很可能在遭到极端武装的拒绝或在未来遭到极端武装背叛。因此，温和的反对派武装即便面对被歼灭的可能性，也只能与极端武装进行武力对抗。但当温和派占据上风时，如果极端理念反对派同意改变自身极端的理念，那么温和的反对派武装更可能会保证其安全，并且接纳其进入联盟。

总之，在实力不均衡的情况下，相同理念（无论是温和还是极端）的反对派武装更可能会出现联盟行为，而不同理念的武装则需要分类讨论。

^① Navin A. Bapat and Kanisha D. Bond, "Alliance between Militant Group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4 (October 2012), pp. 793-824.

推论 2.1: 在温和派与温和派之间, 无论是实力是否均衡, 反对派联盟都能形成。

推论 2.2: 温和派与极端派武装之间在实力均衡时, 将爆发内部冲突; 在实力不均衡时, 拥有较强实力的极端武装会发动对温和派的清洗; 但在温和派拥有较强实力的情况下, 极端武装可能通过去极端化加入温和派联盟。

推论 2.3: 在极端派与极端派之间, 在实力均衡时, 将爆发内部冲突。在实力不均衡时, 将形成两者的联盟。

表 4 实力均衡时反对派武装之间相对实力对其理念的影响

AB 武装实力均衡

B 武装 \ A 武装	极端理念	温和理念
	极端理念	相互攻击导致联盟无法维持
温和理念	相互攻击导致联盟无法维持	联盟保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 5 实力不均衡时反对派武装之间相对实力对其理念的影响

AB 武装实力不均衡 (A 武装实力强于 B 武装)

B 武装 \ A 武装	极端理念	温和理念
	极端理念	B 武装追随 A 武装, 融入 A 武装后, 联盟建立
温和理念	B 武装遭到 A 武装清洗, 内部冲突	联盟维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4. 外部支持

在本文中, 外部支持被设定为主权国家对内战中某反对派组织的支持。外部支持即可被视为物质性因素, 也可被视为理念性因素。一方面, 外部支持国通过直接军事支援改变了反对派内部的相对实力对比, 从而对反对派联盟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 外部支持国也是带有自身理念的, 其支持对象只会是与其理念相符的反对派武装。因此, 该因素使得反对派武装在构建联盟时除了要考虑彼此的理念, 还需考虑外部支持国的理念。本文认为, 外部支持国会是在内战数量众多的反对派武装中寻求与自身理念较为相近的组织。例如, 在叙利亚内战中,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就偏向于支持伊斯兰武装力量, 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

偏向支持叙利亚自由军和库尔德武装等世俗派反政府武装。故而，当一个组织接受外部支持时，其选择盟友的空间就会受到其外部干预力量的控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只有那些外部支持方认可的组织才可纳入其联盟之中。

推论3：在外部支持存在的情况下，一个组织联盟构建中选择与其理念类似的反对派联盟可能性就越高，其与不同理念反对派武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上升。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结合后对反对派联盟的影响，本文表明，理念因素只有在满足相应的物质因素前提下，才可产生其对反对派联盟的影响。在政府军实力强大和反对派内部存在一个拥有较强实力的温和派武装的情况下，理念因素无法影响反对派联盟的构建。而在政府军实力较弱和反对派内部相对实力较为均衡的情况下，理念会对反对派联盟与否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在加入外部干预的变量后，外部支持国家的理念也对反对派联盟造成影响。

表6 外部支持对反对派联盟形成的影响

A 武装 B 武装	符合外部支持者理念	不符合外部支持者理念
符合外部支持者理念	联盟	内部冲突
不符合外部支持者理念	内部冲突	同之前的分析 ^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案例分析：叙利亚反对派联盟行为介绍及分析（2011-2016年初）

本文选择叙利亚内战作为此次研究的案例，主要因为叙内战是一场典型的多行为体内战。在过去五年的内战进程中，叙利亚内战中不同反对派组织分分合合，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案例。此外，在既有研究中，也有学者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叙利亚内战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联盟基本情况。例如，查尔斯·李斯特（Charles Lister）研究揭示了叙利亚内战中自由派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武装和极端武装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敌视的复杂关系。^② 而中国学者龚正的研究则介绍了

^① 这就是指两支武装都没有受到外部支持国的青睐。本文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支持对此类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是没有影响的，故此处同之前的分析。

^② Charles Lister, "Dynamic Stalemate: Surveying Syria's Military Landscap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4/05/19-syria-military-landscape-lister>.

在叙利亚内战中各个主要反对派武装组织的基本情况。^① 这些研究对本文案例分析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

本文采取案例内变化 (Within Case Variation) 的方法, 该方法强调对单一案例中的不同阶段进行比较, 从而在控制背景因素的情况下, 比较不同阶段因素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一种观察因果机制的有效方法。^② 不过, 由于本案例聚焦于叙利亚内战本身, 故其在外部的有效性确实存在不足。但是通过对叙利亚内战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可以初步体现出笔者所提出理论的效力和局限, 也可为下一步更加正式的实证检验打下基础。^③

在叙利亚内战中, 反对派武装按其理念可分为世俗反对武装、伊斯兰反对武装、极端主义反对派武装、库尔德反对武装四类。^④ 出于篇幅和族群内战特殊性的原因, 本文主要考虑前三派反对派武装, 并在其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武装进行分析。在这其中, 世俗派反对武装以叙利亚自由军为代表, 该组织在叙利亚内战开始阶段即参与到反对现政府的军事行动中。伊斯兰反对武装以“利维坦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Ahrar al-Sham) 为代表。这一批组织信奉伊斯兰教, 试图建立伊斯兰政权, 但与极端主义武装有所区别, 认为伊斯兰国家应与现代政体的融合, 并且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武装以“胜利阵线”(Jabhat Al-Nursa)^⑤ 和“伊斯兰国”为代表。这些组织主张采取原教旨主义建立极端的“伊斯兰哈里发国”, 与国际圣战运动和其他恐怖组织具有很强的联系。以上各派反政府武装实力不同, 且随着战局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截至2016年初), 极端组织中的“伊斯兰国”实力最强, 而“胜利阵线”实力与“伊斯兰国”相比则相对较弱, 但与其他反对派相比实力则较强。伊斯兰阵营中的“利维坦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与“胜利阵线”的实力基本不相上下, 而叙利亚自由军实力最弱。^⑥ 这些组织的理念极端性、自身实力和外部支持情况如表7所示。

① 龚正:《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 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0期, 第21-27页。

② 关于这一方法, 可参考 David Collier, James Mahoney and Jason Searwright, "Claiming Too Much: Warnings about Selection Bias,"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Lanham: Row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4, pp. 93-94.

③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撰写于2016年上半年, 使用的材料是根据2016年前叙利亚内战的反对派联盟情况。众所周知, 在2016-2017年间叙利亚内战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这些变化并未包含在本文之中, 笔者将另撰文分析。

④ 关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基本分类和情况介绍, 可参见龚正:《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 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0期, 第21-27页。

⑤ 本文中的“胜利阵线”与“征服阵线”两个术语可以完全替代。

⑥ 以上判断主要基于维基百科和相关资料上对于叙利亚反对派各个武装实力的评估。

表7 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武装情况总结

组织名称	理念极端性	组织实力	外部支持方
“伊斯兰国”	极端	强大	全球恐怖主义网络
“征服阵线”（原“胜利阵线”）	极端	较强大（但没有“伊斯兰国”强大）	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基地组织
利维坦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	中间	强大	海湾国家和土耳其
叙利亚自由军	温和	实力较弱	先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如今外部支持较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斗而不破：叙利亚自由军与伊斯兰武装的联盟关系

在叙利亚内战初期，由于其他武装势力尚未登场，叙利亚自由军一度在叙利亚各反对派武装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叙内战初期的几场战役中，^① 叙利亚自由军都是战斗的主力。随着战局的发展，叙利亚自由军逐步整合，在内部谋求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使其组织化程度进一步上升。这主要体现在叙利亚最高军事指挥委员会组织（Supreme Military Council）的成立。这一组织被视为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军事分支，其主要目的在于统一叙利亚内战中反对派各个派别，形成统一的联盟。在2013年，叙利亚自由军构建了叙利亚革命阵线（Syrian Revolutionary Front），将原有内部成员再次整合。^② 在此阶段，叙利亚自由军曾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一度被视为西方倒阿萨德势力的主要代理人。不过由于美支持力度不足，叙利亚自由军并未获得足够多的外部援助。^③

在叙利亚自由军出现的同时，叙利亚内部的伊斯兰主义者也成立了自身的武装。这些武装以在叙利亚内战前叙利亚本土的伊斯兰地下反对组织为基础，结合

^① 拉斯坦战役（Battle of Rastan）和萨巴达尼战役（Battle of Zabadani）都是典型的案例，参见“Syrian forces pound western city in battle against defectors,” CNN, September 28, 2011, <http://edition.cnn.com/2011/09/28/world/meast/syria-unrest>; Ruth Serlock, “Rebels hail ‘first free town in Syria’ as Assad troops flee,” *The Scotsman*, January 19, 2012, <http://www.scotsman.com/news/world/rebels-hail-first-free-town-in-syria-as-assad-troops-flee-1-2066664>。

^② Aron Lund, “The Syria Revolutionaries’ Front,” December 13, 2013,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syriaincrisis/?fa=53910>。

^③ “U. S. Secretary of State Announces Non-Lethal Aid to Free Syrian Army,” February 28, 2013,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political-update-us-secretary-state-announces-non-lethal-aid-free-syrian-army#sthash.BppjIeQo.dpuf>。

叙利亚内战中从政府监狱释放的政治犯。在伊斯兰武装之中，较有实力的组织分别是“利维坦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军”（Jaysh-al-Islam）。叙利亚的伊斯兰反政府武装也开始构建自身的联盟，2011年11月，“叙利亚伊斯兰阵线”（Syrian Islamic Front）宣布建立，标志着第一个伊斯兰反政府武装联盟的成立。经过一系列吞并和重组，2013年11月，在叙伊斯兰武装宣布解散“叙利亚伊斯兰阵线”，并将其融入“伊斯兰阵线”（Islamic Front）联盟，一举成为当时叙利亚内战中最为强大的反政府武装军事联盟。伊斯兰武装受到了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支持。“伊斯兰阵线”的形成就是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撮合的结果。^①

在内战初期，为应对政府军的围剿，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阵线”在战场层面进行了充分合作，构成了一个反对阿萨德政府的联盟。不过伴随战局的发展，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武装的相对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2012年到2013年4月之间，叙利亚自由军武装在对政府军交战中取得上风，获得多次胜利，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南部德拉省纷纷取得胜利。但在2013年4月之后，叙利亚战局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政府军在多个战线发动反攻，夺回了之前被反对派攻占的瓦迪代夫（Wadi al-Deif）等城市，并且攻下了古塞尔（al-Qusayr）等战略要地。^② 在此阶段，叙利亚自由军遭到重创，实力渐弱于伊斯兰武装。在此阶段，伊斯兰武装与叙利亚自由军内部摩擦也开始呈现。叙利亚伊斯兰武装表示其虽可和自由军进行军事合作，但并不愿接受其最高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同时，自2013年“伊斯兰阵线”建立后，该组织多次试图侵占叙利亚自由军总部和军火库。^③ 不过此类矛盾都处在可控的范围，双方并未爆发严重的内部冲突。

根据上文，可见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阵线”之间的联盟关系可谓斗而不破，在联盟与摩擦中曲折前行。为什么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武装会形成这一类型关系？此问题可用本文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

第一，强大的政府军实力是导致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武装反政府联盟构成

^① Syrian FSA fades in shadow of Saudi-backed opposition front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3/12/syria-fsa-islamic-front-geneva-ii-jarba.html>), Al-Monitor, 11 December 2013.

^② 周亦奇：《内战终止理论与叙利亚内战政治解决前景》，载《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1期，第91页；Robert Fisk, “A Syrian solution to civil conflict? The Free Syrian Army is holding talks with Assad’s senior staff,”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30, 2013.

^③ Peter Beaumont, “Growing Strength of Syria’s Islamist Groups Undermines Hopes of Ousting Assad,” *The Guardian*, December 14,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dec/14/syria-islamist-militants-growing-strength>; 龚正：《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0期，第24页。

的主要因素。前文表明,叙利亚自由军与伊斯兰武装主要是由于对抗政府军的需要而进行联盟。这体现了本文推断1的逻辑。

第二,单纯的物质因素无法解释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武装的联盟关系。在“伊斯兰阵线”建立时,其相对实力已经超过了叙利亚自由军。如若按单纯相对实力对比的推论逻辑,此时“伊斯兰阵线”就应彻底清洗叙利亚自由军,夺取其资源。但现实情况表明,“伊斯兰阵线”虽然与叙利亚自由军出现摩擦,但双方没有采取彻底剿灭对手的行为。这种斗而不破的行为只能用双方理念差异来进行解释。首先,伊斯兰武装虽然自比“温和伊斯兰”,但由于支持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其理念与叙利亚自由军相比仍然略显极端。根据理论推论2.2的逻辑,更极端的武装组织若占据实力上风,便会打击其他温和派武装。其次,“伊斯兰阵线”所秉持的理念又远比“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温和。根据推论2.1的逻辑,温和武装组织之间无论实力差异大小都会保持联盟关系。将这两个逻辑进行中和,就可推断出“伊斯兰阵线”与叙利亚自由军虽有摩擦,但不会上升为严重冲突的判断。而这也与实际情况相符。

第三,这一案例也体现了本文关于推断3的逻辑。作为伊斯兰武装的主要外部支持国,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在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具有两重性:首先,作为美国的西方盟国,其在推翻阿萨德政权上与西方国家有共同的诉求。其次,因为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近年来积极向外输出伊斯兰思想,其也希望伊斯兰反对派武装可在叙内战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些国家虽不会让自身支持的伊斯兰武装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为敌,但也不愿坐视叙利亚自由军做大。故而,让伊斯兰武装维持与叙利亚自由军斗而不破的联盟关系,并时不时对叙利亚自由军进行骚扰以削弱其实力,就成了最符合外部支持国的选择。而这一逻辑也体现在实际情况之中。

(二) 与狼共舞:征服军联盟的形成与“胜利阵线”的改名

“胜利阵线”(现改名为“征服阵线”)是叙利亚内战中一支强大的极端主义武装。该组织理念极端,谋求超越民族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政体,并直接听命于基地组织领袖扎瓦赫里的指挥和领导。^①在叙利亚内战初期,“胜利阵线”即参与

^① Jennifer Cafarella, *Jabhat Al-Nusra in Syria An Islamic Emirate for Al-Qaeda*, Institute of War Studies, 2014,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report/jabhat-al-nusra-syria>; “Syria Update: Jabhat Nusra Aligns with al-Qaeda,”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syria-update-jabhat-nusra-aligns-al-qaeda>.

叙利亚内战，并在多地采用恐怖主义手段来进行袭击，造成了叙民众的恐慌。^①因此，在战争初期，“胜利阵线”武装并未得到叙利亚民众和其他反对派武装的支持。不过自从2012年叙形势从社会抗议逐步转向全面内战后，“胜利阵线”开始由恐怖组织向反政府武装转型，并谋求与叙其他反对派武装结盟。之后，“胜利阵线”逐步成为叙利亚反对派联盟的重要伙伴。由于叙利亚地理格局的原因，叙利亚以大马士革-阿勒颇为界可分为东西两部分，“伊斯兰国”的活动地区是在叙利亚东部与伊拉克交界的代尔祖尔、拉卡等地区，而“胜利阵线”主要在西部伊德利卜、哈姆和阿勒颇等地。由于叙利亚西部是该国人口的聚集区，故而政府军采取了东缓西进的策略，对东面的“伊斯兰国”镇压力度较弱，而将主力放在西线镇压叙利亚反对派。因此，“胜利阵线”和其他反对派组织（包括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武装等势力）始终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必须结盟共同抗敌。而“胜利阵线”强大的武装力量，使其成为反对派联盟打击叙利亚政府军的关键依靠。根据相关研究，“胜利阵线”因其特种战术优势，在反对派对政府军的作战中起到出奇制胜的作用。^②此外，“胜利阵线”也从其长远角度考虑，区分了建立“哈里发国”的长远目标和当前协助叙利亚反对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短期目标，将其自身标榜为叙利亚而战的民族主义组织，从而缓解了与其他反政府武装结盟的理念障碍。并且，“胜利阵线”采取了务实的联盟手段，将联盟重点放在与其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逊尼派穆斯林武装上，^③从而确保了联盟的可持续性。

伴随着战事推进，“胜利阵线”逐步成了叙利亚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2014年10月，“胜利阵线”“利维坦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沙姆猎鹰旅”（Suqour al-Sham Brigade）与“阿克萨战士”（Jund al-Aqsa）等组织组建“征服军联盟”（Army of Conquest）。随后，该联盟在此地区逐步站稳脚跟，并开始取得了对政府军的战场优势，获得了对伊德利卜全省的控制权。^④

由于“胜利阵线”自身意识形态的极端性，叙利亚反对派与“胜利阵线”的同盟一直被认为是危险的选择。而伴随叙利亚“征服军同盟”在伊德利卜省站稳

^① 例如，“胜利阵线”在2012年进行了多起自杀性人体炸弹行动。Charles Lister, “Profiling Jabhat al-Nusra,” *Analysis Paper*, No. 24, July 2016, The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profiling-jabhat-al-nusra>.

^② Jennifer Cafarella, *Jabhat Al-Nusra in Syria An Islamic Emirate for Al-Qaeda*, pp. 22-23.

^③ Jennifer Cafarella, *Jabhat Al-Nusra in Syria An Islamic Emirate for Al-Qaeda*, pp. 16-20.

^④ “Syria Situation Report: April 20-28, 2015,” http://1.bp.blogspot.com/-yrgOK2EIE2E/VUATT4dX77I/AAAAAAAADEY/xlcb-U9TBr/s1600/SYR%20BSITREP%20BMap%20BApril%20B20-28%202015_high.png.

脚跟后,反对派武装之间因为战场需要而掩盖的矛盾也逐步浮现。这可在“胜利阵线”等极端武装与其他反对派之间的摩擦中体现。例如,自2014年下半年来,伴随着“胜利阵线”在伊德利卜省逐步站稳脚跟,其开始频频挑起与叙利亚自由军下属哈兹穆运动(Hazzm Movement)的冲突。从2014年7月“胜利阵线”发动的“清除腐败战役”^①到10月“胜利阵线”夺取叙利亚自由军20个村庄的控制权,^②“胜利阵线”多次与叙利亚自由军发生摩擦。不过,这些摩擦都没有升级到大范围的内部冲突,^③“胜利阵线”与其他反对派武装联盟关系基本维持。

由于“胜利阵线”的极端理念,自2014年7月以来,“胜利阵线”先后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共同的军事打击的主要目标。并且,该地区的国家进一步整合此地区的伊斯兰武装联盟,试图建立一个将“胜利阵线”排斥在外的联盟。例如,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也开始积极在“利维坦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两支队伍之间进行斡旋,谋求双方的合并。^④但此尝试并不成功,由于抵抗政府军的需要,在叙利亚当地的伊斯兰武装依然难以放弃与“胜利阵线”的合作关系。不过在此阶段“胜利阵线”对其组织名称和隶属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名为“征服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宣布断绝与基地组织关系。虽然截至目前,“征服阵线”依然被西方国家列为恐怖主义组织,^⑤但“胜利阵线”的改名表明对其极端理念进行了一定妥协,并得到了外部支持者的响应。有消息表明,海湾国家正在斡旋,试图在未来建立一个由“征服阵线”“利维坦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军”三支逊尼派伊斯兰武装组成的联盟。^⑥

观察“胜利阵线”与其他温和派反对派武装构建的联盟,可见该情况在一些方面与前文理论推论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却不同。就一致性而言,政府军压力

① Jennifer Cafarella, "Jabhat al-Nusra Regroups after ISIS," <http://iswsyria.blogspot.com/2014/09/jabhat-al-nusra-regroups-after-isis.html>.

② "Syria Update: December 3-9, 2014," <http://4.bp.blogspot.com/-qaANj11ykDk/VIdxMWCmztL/AAAAAAAAACS4/K4f9jEOKWm/s1600/Syria%2BSITREP%2BMAP%2B2014-12-09%2BHIGH-01.png>.

③ 数次纷争都在当地伊斯兰教会法庭和其他组织的调停下和平解决。参见 Jennifer Cafarella, "Jabhat al-Nusra Regroups after ISIS," <http://iswsyria.blogspot.com/2014/09/jabhat-al-nusra-regroups-after-isis.html>.

④ Jennifer Cafarella, "Possible Upheaval in Syria Capital," <http://iswsyria.blogspot.com/2015/05/warning-intelligence-update-possible.html>.

⑤ Charles Lister, "Profiling Jabhat al-Nusra," *Analysis Paper*, No. 24, July 2016, The Brookings,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rofiling-jabhat-al-nusra>.

⑥ Mariam Karouny, "Insight -Syria's Nusra Front may leave Qaeda to form new entity," *Reuters*, March 4, 2015, <http://uk.reuters.com/article/uk-mideast-crisis-nusra-insight-idUKKBNOM00G620150304>.

依然是促进不同理念，尤其是含有极端主义理念的反对派联盟成立的主要动因。正如后文所示，“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由于面临不同的政府军压力，形成了不同的联盟行为。此对比更加彰显了政府军压力的重要性。

从差异性而言，在攻下伊德利卜省后，“胜利阵线”确保了自身在此地区的生存安全，并且在相对实力上也保持了与其他反对派的均衡和一定程度的优势。在此情况下，若按照本文理论框架的推断，“胜利阵线”应与其他组织爆发内部冲突，但是这一情况却在现实中没有出现。“胜利阵线”虽然与某些个别反对派武装产生摩擦，但是还基本维持着与其他反对派武装的联盟关系，并且“胜利阵线”也对其理念进行妥协和调整。这就与理论部分的推断相矛盾。对此，本文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前文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设是基于一个只有两个武装的理想型反对派联盟，而在叙利亚内战中实际存在多个反对派武装。因此，虽然从单独的比较而言，“胜利阵线”实力强于其他反对派武装，但如果将温和理念的反对派武装实力进行加总，“胜利阵线”就是面临着一个比其实力更强的温和反对派联盟。而这就可依据本文推论 2.2 的逻辑对“胜利阵线”的行为进行解释。由于其面对一个占据强势地位的温和武装联盟，这一实力差距的压力导致其对自身极端理念进行妥协，并维持了联盟。其次，本文理论模型假定反对派武装的理念是较为稳定的，在长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但由于理念本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故而也不能排除理念伴随着互动的变化而发生调整。“胜利阵线”通过与其他温和派武装长期合作，可能也受到其他组织理念社会化的影响，从而开始对自身的理念进行调整。

最后，反对派武装与“胜利阵线”组织的合作违背了外部支持者的立场。这表明在本案例中，外部支持并不能影响反对派联盟的合作，该推论失效。首先，这说明了外部支持者对反对派联盟产生影响的局限性。反对派组织虽然接受外部支持，但为了战场需要的考虑，反对派组织也可违背外部支持者的立场。因此，推论 3 提出的逻辑在此案例中的失效，其实从侧面彰显了关于政府军实力的推论的有效。其次，虽然外部支持没有直接影响到反对派的联盟选择，但从“胜利阵线”的改名可看出，外部势力对反对派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只是在实际战场的需要情况下，改变了影响的模式。外部影响除了单纯的限制反对派与范围结盟，还可以通过施加压力改变极端组织与温和组织之间的相对实力对比，从而迫使极端组织改变自身理念。

（三）一山不容二虎：“伊斯兰国”与“胜利阵线”的分裂与冲突

“伊斯兰国”与“胜利阵线”的分裂和冲突是叙利亚内战中极端主义阵营最

令人困惑的问题。追溯这两个组织的历史,可发现“伊斯兰国”与“胜利阵线”同宗同源。在叙利亚内战初期,“伊斯兰国”的前身、盘踞在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根据当时基地组织领袖扎瓦赫里的指示,派遣叙利亚籍成员阿布·穆罕穆德·戈兰尼(Abu Mohammad Golani)前往叙利亚以开辟该组织在当地的分支机构。^①2012年1月,戈兰尼正式将组织名称定为“胜利阵线”。此后,“胜利阵线”一直作为“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分支机构在叙利亚进行活动,并逐步也与其他反对派联盟形成联盟关系。^②据相关资料,直到2013年初,“胜利阵线”近一半的资金还来自于“伊拉克伊斯兰国”。^③

虽然初期“胜利阵线”与“伊斯兰国”紧密联盟,但是伴随着“胜利阵线”实力的增强,“伊斯兰国”对其的防备越发上升。2012年末,“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要求“胜利阵线”宣誓对其效忠,并且公开其与“伊斯兰国”的隶属关系,但是这一要求遭到“胜利阵线”领袖戈兰尼的拒绝。2013年4月,“伊斯兰国”宣布其将与“胜利阵线”合并,但是,“胜利阵线”随后宣布拒绝与“伊斯兰国”合并。^④两个组织正式分裂。2014年1月,在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阿勒颇市和中部的拉卡市等五省,包括“胜利阵线”“伊斯兰阵线”、叙利亚自由军在内的反政府武装对“伊斯兰国”发动袭击。^⑤2014年4月到7月间,“伊斯兰国”对代尔祖尔省的进攻中,包括“胜利阵线”“伊斯兰阵线”等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共同组建了“圣战者舒拉委员会”,试图抵抗“伊斯兰国”在此省的扩张。^⑥

“伊斯兰国”与“胜利阵线”的决裂,首先体现了本文关于政府军实力推断

^① Charles Lister, “Profiling Jabhat al-Nusra,” *Analysis Paper*, No. 24, July 2016, The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profiling-jabhat-al-nusra>.

^② 当时其他反对派组织都与极端组织有较多的合作,“利维坦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Ahrar al-Sham)领导哈桑·阿布德(Hassan Aboud)在2013年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和它们与自由军目标没有区别,只有手段的区别,并承认在战场上与‘伊斯兰国’存在合作。”参见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talktojazera/2013/12/hassan-abboud-will-fight-our-rights-20131217132919290655.html>.

^③ Charles Lister, “Profiling Jabhat al-Nusra,” *Analysis Paper*, No. 24, July 2016, The Brookings, pp. 9-15,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profiling-jabhat-al-nusra>.

^④ Charles Lister, “Profiling Jabhat al-Nusra,” *Analysis Paper*, No. 24, July 2016, The Brookings, pp. 9-15,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profiling-jabhat-al-nusra>.

^⑤ Charles Lister, “The anti-Jihadist Revolt in Syria,” The Brookings,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01/19-anti-jihadist-revolt-syria-lister>.

^⑥ Jennifer Cafarella and Valerie Szybala, “ISIS’s Second Front in Syria,” <http://iswsyria.blogspot.com/2014/06/isiss-second-front-in-syria.html>.

的有效性。正如前文所言，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主攻西线，东线的“伊斯兰国”并非打击重点，故而，“伊斯兰国”遭遇的政府军压力较小，因此更加可以按照其理念本身行事，而“胜利阵线”遭遇的政府军威胁较大，故而其只能与其他反对派武装结盟，并跟随其他武装对“伊斯兰国”进行打击。其次，本案例体现了本文关于极端主义势力在势力均衡时将相互对抗，而只有在实力不平衡时才可联盟的逻辑。在“胜利阵线”建立初期实力远弱于“伊斯兰国”，故而其在当时紧跟“伊斯兰国”，成为其联盟中的一部分，并尊重其领导。但随着“胜利阵线”的实力日益加强，“胜利阵线”和“伊斯兰国”对世界“圣战”运动领导权的争夺日益激烈，^①并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决裂。这充分体现了本文推论 2.3 的逻辑，极端理念组织之间的联盟只能在一个相对实力不平衡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一旦两支组织实力相近，极端理念之间互斥性便会增强，从而导致内部冲突。

表 8 叙利亚战场实际情况总结

组织名称	联盟情况	理念情况	政府军实力假设	反对派内部 相对实力假设	外部支持假设
叙利亚自由军与伊斯兰武装	有摩擦但基本维持	有差异，但总体都属温和派	遭遇较强的政府军压力	伊斯兰武装强于叙利亚自由军	外部支持国资助伊斯兰武装，对叙利亚自由军不敌视，但不支持
“胜利阵线”与其他反对派武装	有摩擦但基本维持	温和与极端	初期遭到较强的政府军压力，随后压力减轻	两两比较情况下，“胜利阵线”保持实力均衡，但如将其他温和派理念反对派武装实力加总，“胜利阵线”则弱于温和派武装	外部支持国资助其他武装，对“胜利阵线”敌视
“胜利阵线”与“伊斯兰国”	先联盟再冲突	极端与极端	“胜利阵线”遭遇到较强的压力，但“伊斯兰国”压力较轻	“胜利阵线”初期弱于“伊斯兰国”，但随后逐步与之实力均衡	未检验 ^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Daniel Byman, “Comparing Al Qaeda and ISIS: Different goals, different targets,” The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testimonies/comparing-al-qaeda-and-isis-different-goals-different-targets>.

^② 本文所指的外部支持是指主权国家的支持，就目前所知信息而言，没有主权国家会直接支持极端主义组织，故而在此处这一变量无法进行检验。

四 结语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进行交互后,对反对派联盟构建和内部冲突爆发的影响。结合叙利亚案例,本文理论部分提出的逻辑推断在叙利亚内战的实际环境中大多数都得以体现。不过,在叙利亚温和派反对派与极端组织“胜利阵线”的联盟构建上,现实情况与理论部分中相对实力对比变量和外部支持变量的预期有所不符。这一不符合的预期表明,本理论框架需要对反对派联盟内部成员数量和理念因素的建构性做出更符合实际的设定。当然,此研究只是一个起点,今后的研究还可以在如下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在案例选择上,虽然本文的研究将案例选择为叙利亚内战的不同阶段,但由于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具有的推广意义,今后的研究可以将更多国家与案例放在本文框架内进行跨案例、跨区域甚至大样本的案例比较。

第二,在理论设计上,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将重点放在反对派联盟内部组织结构上,就平等性联盟和等级制联盟两方面进行分类讨论。同时,本研究探讨的重点是内战进程中的联盟行为,但是已经有研究发现,内战结束后的联盟存续也是对政治转型和内战是否再次爆发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这一问题也可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第三,本研究除了试图在理论上有所贡献外,还希望能够对相应的政策讨论有所贡献。伴随着叙利亚问题的深入和阿拉伯世界整体转型的发展,对于该地区冲突的国内层面的行为体进行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出更加精准的政策,从而帮助中国在此地区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收稿日期:2016-07-15】

【修回日期:2016-11-08】

【责任编辑:谢磊】

beyond specific technology or programs. Now, China is looking at the outer spac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It wants to push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more constructive in global outer space governance so that the US may jointly shoulder the major powers' responsibility with China to maintain outer space peace and security.

[Keywords] Outer Space Cooperation, China-US Relations, Civilian Aerospace, Outer Space Security, Global Commons

[Author] WU Chunsi, Associate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200233).

12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Infighting among Rebel Groups: A Case Study of Syrian Civil War**

ZHOU Yiqi

[Abstract] During the civil war, various rebel groups may at times form alliances in their confronta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while at other times they may engage in fierce conflicts and fighting among themselves. Why does a rebel group that figh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become engaged in another struggle? This research topic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civil wars. When applied alone, neither the ideational factors nor the material factors are capable of providing satisfactory answers. This article may offer an integrated explanatory framework camping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It argues that the ideational factors, when interacted with the material factors, will influence rebel groups' choice between alliance format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 When government's repressive capacity is strong, ideational factor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The relativ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rebel groups will diversify the influence of ideational factors, while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 support will strengthen it. With the Syrian Civil War as an illustrative cas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xplanatory framework by making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in it.

[Keywords] Rebel Group Alliance, Syrian Civil War, Rebel Group,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l Conflict

[Author] Zhou Yiqi, Assistant Researcher, Institutes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and Center for West Asia and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3).